

建构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

苗 威

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中国边疆学成熟的标志以及显性的必要条件。历史上，边疆在中国文明的视域中得到了充分的关注，积累了系统而丰富的文献史料以及多角度的理论探讨。近30年，围绕边界、治理、安全以及利益等问题形成了系列话语，并突显了传统与现实交织的困惑以及与周边邻国的话语体系交叉的困扰等特点。建构符合中国边疆历史，服务于中国边疆现实的话语体系，是中国边疆学的重要工作。

关键词 中国边疆 话语体系 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作者苗威，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地址：山东省威海市文化西路180号，邮编264209。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①的指导思想，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发展方向，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热点。而中国边疆学作为新兴学科，加强三种体系的构建，是新时代赋予边疆学人的使命，也是厚积千年的中国边疆研究薄发的关键所在。对于中国边疆学而言三种体系同等重要，但是，话语作为传输知识、表达思想的媒介，其系统与科学性的建构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②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是中国边疆学完成学科建设的必要条件，是中国边疆学的学术能够合理、完整而有效表达的必要条件，同时是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增强话语权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必然要求；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国际影响力和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③由于“边疆”连接此疆与彼界的固有特色，话语体系所表达的边疆思想的严谨、合理与科学至关重要。

一、中国边疆话语体系的学科条件

经历千年积累，百年探索，三十年创新，中国边疆研究已经基本完成学科层面的建构。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专项（17VGB005）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2016-05/18/c_1118891128.htm，访问时间2018年4月10日。

^③ 参见朱继东、李艳艳《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必须防止的几种倾向》，《红旗文稿》2012年第21期。

学界普遍认为,汇集某一门类知识的平台,即是学科。有关于中国边疆的知识汇聚在一起,由同一个平台所承载,便形成了有明确定位和鲜明特色的中国边疆学。中国边疆学纵向的学科体系布局合理、发散整合的情况良好:中国边疆历史、中国边疆政治、中国边疆经济、中国边疆地理、中国边疆民族等二级学科,每个二级学科之下有若干三级学科。研究方法多样,历史与现实结合,基础与应用结合,^①同时在学科体系的框架内,与知识的创新、传授、研究等有关的学科建设活动开展层面丰富。中国边疆所涵盖的区域广阔,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各边疆地区分别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教育与研究,特殊性与共性交织,构成了现阶段中国边疆学繁荣的学科建设状况。中国边疆的学科、学科体系、学科建设的现实情况以及学理层面,鲜明地透视出话语体系的重要性。一方面,话语是表达边疆思想与传递边疆知识的媒介,没有科学、成熟的话语体系,学科便失去了成立与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中国边疆学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主要是通过话语体系来体现与表达的。同时,成熟的学科要求构建科学、合理的话语体系,以表现其对现实具有指导作用、对未来具有预测作用、对于跨边疆的域外具有可交流性。所以,学科建设的根本就是话语体系建设,“话语没有特色,学科难言价值;话语体系没有形成,学科体系难言影响。”^②中国边疆学发展至今,构建适应边疆属性、符合中国边疆特点的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边疆学的学术体系是中国边疆学知识(特别是有关边疆沿革的知识)、理论以及实践的系统化,是中国边疆学领域专门认识活动的产物,是中国边疆文明发展的结晶,承载和映现了中国边疆的历史和现实。通常认为,学术体系包含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学术成果、学术人物、学术方法、学术评价、学术影响、学术传承、学术风气等方面,是学术能力和学术水准的集中体现,其系统化的过程大体是基于资料、始于问题、链以逻辑。新时期的中国边疆学研究应坚守千年传承,以边疆为畛域,既了解“内”,更了解“外”,少一些瞻前顾后,欲言还休,多一些问题意识、中国认识、实践方法。在一度“失语”的学术体系中嘹亮发声,不能因为今天有所顾忌所带来的失语,造成明天无可挽回的“失忆”。中国特色的边疆学正处于建设的关键时期,面对各种机遇与责任、问题与压力,中国边疆学学者应当有所作为,适时完善中国特色的边疆学三个体系,学习边疆,研究边疆,并以学术戍守边疆,进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良性互动与健康发展。

近40年来,在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原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为核心的边疆研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边疆学在学科目标的提炼、学科结构的打造、学科框架的搭建、研究平台的推出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在研究人员的培养、学术成果的积累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果。但是,应该看到,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相对弱化,尤其是在某一学术体系与邻国的学术体系相交叉、叠合时,往往自缄其口,造成话语断裂、缺失甚至失语。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和话语创新相对滞后,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价值也才更加突显。

尽管具备深厚的积淀与传统,但从学科层面而言,中国边疆学尚处于建设的过程之中,仍然属于新兴的学科,有许多环节需要完善与丰满。“三个体系”的建设都有待于夯实与加强,而话语体系作为其中最显性的组成与核心表达,具有更多的实践意义,因而需要更为充

^① 参见马大正《关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学术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

^② 参见张桂林《逻辑要义、历史努力与认知前提: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

分的建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新兴的、具备重要实践指导指向的中国边疆学,尤其“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的建设”。^①努力构建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是时代的使命。

二、中国边疆话语体系的历史基础

话语体系是学科存在的基础。学科的价值取决于话语体系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指导实践的能力。因而,建构既可以通古今之变,又能够充分解释现实、预测未来的话语体系,着力打造其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是中国边疆学存在以及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边疆学作为尚在建设中的新兴学科,无论是学理,还是话语体系都处于探索与完善阶段,然而,由于具备坚实的基础,中国边疆话语体系日趋完善而成熟,中国边疆学建构完成已经破茧可期。

首先,建构中国边疆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充分的文献依据。汉字是世界最悠久的文字之一,更是当今世界唯一不曾间断地通行的古老文字,从成熟的文字甲骨文算起,至少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②因此,中华文明与中国历史在汉字的承载与书写中源远流长,具有持久的延续性与强大的生命力。而中国边疆的盈缩丰瘠、发展嬗变也得到了相对完整的记述,相关话语体系的构建有史可依。

有关中国边疆的文字记载非常丰富,举凡经、史、子、集,从先秦诸子到历代史家,都有着力不同的记述,为我们追溯中国边疆的发展轨迹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也造就了中国边疆悠久厚重、史迹清晰、环环相链、彼此印证的特点。

早在传说时代,中国就有关于边疆的记述。据《大戴礼记·五帝德》载,舜时天下格局稳定“南抚交趾、大教,鲜支、渠度、氏、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羽民。”以“南”、“北”、“东”部边疆所居住的人群为载述对象,清晰勾勒了当时的边疆范围。周朝建立后,关注地域,强调管土,据《左传》昭公九年条载,武王克商之后宣称:“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以东北边疆为例,“息慎”即“肃慎”,分布于不咸山(今长白山)的东北“发”也称作“北发”,是东北地区的貊人,居于肃慎之南,大体是在辽东地区,北与肃慎相连接;山戎的分布区在辽西,即今西辽河、大凌河流域。^③按照五服的观念,天下之民从“地之中”开始,对应政治影响和文化辐射的递减,依次列居,对此《国语》、《禹贡》以及其他经史之中都有体现。四边之民皆在服内,所居之地是谓今天的“边疆”。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访问时间2018年4月10日。

^② 唐兰认为,“汉字有一万年的历史”(《古文字学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陈五云认为,半坡、姜寨等遗址陶器上的符号排列有序(距今有6000—7000年)、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象形符号(距今4500—5000年),从记事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与文字已有关联(《汉字的起源和形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鲁毅认为,汉字的发生远在夏以前,至少在四五千年前,文字已经非常发达(《汉字——中华文明的历史丰碑》,《光明日报》2007年4月6日第9版)。

^③ 参见刘子敏《肃慎族源、地望辨》,韩国暎园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编《亚细亚文化研究》2000年第4期。

自秦汉始,王朝统一模式以及与之伴生的儒家政治秩序,体现在文献修订上,呈现出“内诸夏外夷狄”的文本结构。在汉初所开创的中国正史中,对边疆的书写形成范式。《史记》专门为边疆民族与政治势力列传,分别有《大宛列传》《西南夷列传》《匈奴列传》《东越列传》《南越列传》《朝鲜列传》;《汉书》则为《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匈奴传》《西域传》;《三国志》始有《乌丸鲜卑东夷传》;《后汉书》次第列有东夷、南蛮西南夷、西羌、西域、匈奴、鲜卑乌桓诸传。至唐修八史,一以贯之地严四夷之限,皆有四夷传。“袭冠带以辨诸华,限要荒以殊遐裔,区分中外,其来尚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亘玄方;七戎六蛮,繇西宇而横南极。”^①是谓四夷居于要服与荒服之内。迨至元代史官修宋、辽、金三史时,将前代正史中的“四夷传”“夷狄传”等有关域外记载的列传名称,改以“外国传”,“并从内容与结构上有意识地区分出不同性质的周边”,^②无论是四夷、部族,还是外国与属国的组合范式,中国正史中的边疆或边民,都得到了系统记载与书写,为我们今天的历史解释提供了基本的依据。

其次,围绕边疆以及边疆管理,古代中国已经积淀了相对系统的理论。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边疆并不是固定的区域,而是随着中原王朝的盛衰以及史家视域的伸展有所变动,所以,在研究“中国边疆”的过程中,不能固守条约体系以来所形成的“边界”,而应该历史地看待边疆,而先贤对于政权之“边”早有阐述。

较早的认知相对朴素,比如“天下观”即源于先民的生存体验,最初所谓的“天”是具体而非抽象的概念,表达了人站立于天地之间仰头所见的穹庐;与其对应的是处于天之下,俯视可见的生栖之“地”,是以形成了“天下”的早期意识。上古无国界,“天”以及与天有关的“天子”、“天下”就成为理解传统中华文明的关键词。^③而“天圆地方”的空间秩序也是鸿蒙初辟时“天下观”的预设性框架;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天下”成为“以文化之”的制度世界。^④《诗经·小雅·北山》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先秦天下秩序最为清晰的表达。因而可以理解为,“天”的边缘是最初朦胧的边疆。天下观在中国的影响非常深远。

一方面,为拓展与控制天下,商时有“内外服”制,利用这个由内到外的发散状态,天子把“天下”拓展到了数千里之外。在此基础上,至周时,在天下之内,以都城所在为中心,按距离远近,五百里一服,将“天下”逐级分层,是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以及荒服等五服,最远的即为边疆。^⑤从性质上讲,“西周的五服制是周朝对国内诸侯及边疆民族方国所规定的朝贡制度”。^⑥又据《国语·周语上》祭公谋父所说先王之“五服”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可知,五类服将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诸侯以及方国纳入到西周的朝贡体系中,从而确立了西周对

① 《晋书》卷97《四夷列传》。

② 钱云《从“四夷”到“外国”:正史周边叙事的模式演变》,《复旦学报》2017年第1期。

③ 参见韩东育《东亚世界的“落差”与“权力”——从“华夷秩序”到“条约体系”》,《经济社会史评论》2016年第2期。

④ 李宪堂《“天下观”的逻辑起点与历史生成》,《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

⑤ 参见李大龙《西汉藩属制度(奉职贡)的形成与实践》,《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⑥ 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天下”的国族、周边邦族的管理方法。被纳入要服、荒服的东、南边疆的蛮夷，西、北边疆的戎狄，向西周履行朝贡以及朝见嗣王义务。边疆邦族不仅在政治上以朝贡方式表达对西周的臣服，同时，也在宗教文化方面，以献祭、献役的方式表达对周的认同。^①五服制是东亚世界秩序的早期范式，是古代中国与涉及边疆的重要理论，推动了东亚区域内众多政权的演变和族群凝聚，进而成为古代东亚世界处理政治势力间关系的通用法则。另一方面，天子所统领的“夷”、“夏”，是“天下”最有效的核心力量。夏是指在中原地区形成的华夏族以及由其发展而来的汉族；尽管我国历史上很多民族都有具体的名称，但是夷仍然是华夏族之外的其他族群的泛称。^②夏与华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其所指分别是地理上的华山和大夏，作为先秦各代的政治核心区，华夏与“四方”、“四夷”相对；又以处于“中”而转化为“中华”、“中夏”。^③因而，夏夷之别，在于文野而非血统。但从地域上来讲，夏居于中，而夷列于边，夷为边疆地区的代名词。夷夏观对于中国疆域形成的影响很大，促成了中国核心中原地区的一统^④同时，也为边疆民族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思路，即以夷变夏，在历史上，不乏由地处边疆的夷人突破“夷夏”之防，向中原发展的案例，比如契丹、女真以及满族。所以夷夏之间的互动与凝聚，也是中原与边疆一体化的表现。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萌生于三代，明确于东周的“大一统”观念，落到实处时，其目标直指“天下”，而天子被赋予了最具备“统”的资质与完成天意的政治权威。所谓“一统”，包含两层涵义，即“时空上的‘一’和政治上的‘统’”。^⑤《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条载“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春秋公羊传注疏》：“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可见，大一统强调的是王的绝对权威和天下政令的统一。《春秋集传详说·纲领》云“春秋大一统之义，内京师而外诸夏，内中国而外吴楚，尊王抑霸，讨贼扶善，以存天理而遏乱源。”很明显，京师居于核心地带，而诸夏则居于其外，最外层是蛮夷之风的吴楚，或可理解为边疆。至汉朝时，“大一统”成为天下大治的核心理论。

中国传统的边疆学理论为现代的边疆学提供了深厚的学养。我们应该基于传统的认识体系，聚焦实践理性，发现并解决现实边疆的真问题。以东北边疆为例，从文献的文本呈现来看，由于历史上边疆的动态化演进，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汉唐的治内之地朝鲜半岛北部等区域已经发展成今天的邻国。如果依据今天的边界来建构中国边疆话语体系，忽视历史上的文献传承与理论指导，就会出现认识论上的重大错误。

① 参见张利军《五服制视角下西周王朝治边策略与国家认同》，《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② 《礼记·王制》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③ 参见韩东育《东亚世界的“落差”与“权力”——从“华夷秩序”到“条约体系”》，《经济社会史评论》2016年第2期。

④ 参见李大龙《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

⑤ 韩东育《东亚世界的“落差”与“权力”——从“华夷秩序”到“条约体系”》，《经济社会史评论》2016年第2期。

整体而言,历史时期内,有关中国边疆的文献资料与传统的疆域理论,皆为我们现实思考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三、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与中国悠久的历史相伴随而存在的知识积淀,为边疆学的建构奠定了厚重的基础。从历史的角度看,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在政治一体化、民族共同体的“天下”格局内,中国边疆话语首先在政治层面出现,并贯穿成体系。如上文所述,最早关于“边”的记载见于舜所抚育的四方之民,周武王所称的四方边土;随之,在研究层面出现,形成多套解释体系。自近代以来,基于对边疆历史的反思、解决边疆现实问题的需要等因素,中国边疆研究出现了三次学术高潮,形成了“点”与“面”既自成一统,同时又前后接续延承的学术范式。^①综合而言,近30年来中国边疆学的话语创新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边界话语。条约体系以来,东亚的传统格局逐渐解体,民族国家围绕“边界”来建构自己的历史认识体系,进而对被边界所切割的古史形成截然不同的差异性认识,这种反差极强的认识成为影响邻国关系的鸿沟,甚至是龃龉的导火线。对于跨界历史,改革开放之初,谭其骧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的中朝国界为例,指出“历史上的高丽最早全在鸭绿江以北,有相当长一个时期是在鸭绿江、图们江南北的,后来又发展为全在鸭绿江以南……当它建都鸭绿江北岸今天的集安县境内,疆域跨有鸭绿江两岸时,我们把它的全境都作为当时中国的疆域处理。但是等到5世纪时它把首都搬到了平壤以后,就不能再把它看作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政权了,就得把它作为邻国处理。不仅它鸭绿江以南的领土,就是它的鸭绿江以北辽水以东的领土,也得作为邻国的领土。”^②即以今天国界作为核心判断,都城所在地的位置决定了古代政权的历史归属。这一说法始于1981年,在其后十余年内影响着中国学界对跨界历史的认识。然而“迁都”说不断遭到质疑,世界史学者在反思中认为,“要尊重历史与疆域存在着双向继承的客观事实,而不采取排他独占的立场”。^③随之,对于跨越边界的历史出现“一史两用”的认识^④并展开热议。^⑤以静态的近现代以来所形成的边界衡量动态的历史发展,相较于之前边疆研究一度乏语、边疆史“被”外国史的情况,这一话语看似是一种改变,但是由于存在重大逻辑缺陷以及认识偏差,并没有消除边界双方的话语矛盾与冲突。从中国与周边的良性交往与交流、化解争端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角度,需

① 参见李国强《开启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新征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1期。

②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③ 徐德源《关于朝鲜半岛早期史研究经受误导的反思》,《全国首届高句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第184—195页。

④ 参见姜孟山《高句丽史的归属问题》,《东疆学刊》1999年第4期。

⑤ 参见张碧波《关于历史上民族归属与疆域问题的再思考——兼评“一史两用”史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2期;孙进己《国史范围的确定》,李国强、李宗勋主编《高句丽史新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朴灿奎《浅谈高句丽历史归属研究的几个问题——兼谈古代跨境民族与政权历史归属标准问题》,马大正、金熙政主编《高句丽渤海历史问题研究论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朴文一《关于在历史上“中”与“外”的划分问题之初见》,厉声、朴文一主编《高句丽历史问题研究论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要更科学、踏实、稳健的话语体系。

二是治理话语。中国向来关注边疆的开发和边疆问题的解决，历史上的“边疆”话语和“边政”概念对今天“边疆治理”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①随着边疆治理概念被提出、界定和普遍应用，边疆治理研究逐渐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近年来，正式提出“边疆治理”话语，研究成果众多，并逐渐系统化。^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了一系列治理边疆的新理论和新战略。党的十九大为我国新时代背景下的边疆治理提出了新思路、新理念和方式，为我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政治遵循。中国边疆地区与其他地区一样，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要着力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坚决打击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和宗教极端活动，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坚持“一国两制”，维护祖国统一；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③中国边疆治理与周边国际环境的良好顺畅密切相关，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从中国边疆稳定与周边和睦开始。周边国际环境对中国非常重要，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中国边疆治理的话语体系有效整合了相关的思路与做法、力量，直接指向了边疆的现实问题。

三是利益话语。利益边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出发，用以描述和分析国家的新边疆形态，以及制定地区或全球战略时经常使用的概念和思维。^④这里的“边疆”不是单纯的自然地理的疆界，而是国际关系体系中的边疆。边疆和边界从传统的、有形的地理疆域拓展到无形的利益边疆，导致“边疆”问题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⑤国家利益的延伸和扩展，使原本与首都相距遥远的边疆事务越来越紧密地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边疆的概念随之扩展，在我国也出现了对边疆的新认识。^⑥它超越了传统领土边疆的范畴，是全球化时代突显出来的概念，而非传统的安全。诸如疾病、毒品、生物、资源、信息和恐怖主义等，都涉及利益。^⑦所以，这一新理论、新思路、新概念，需要持续关注，以应对国际跨领土边疆带来的利益“邻居”。

四是安全话语。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边疆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全既包括传统安全，同时也包括非传统安全。边疆的安

① 参见孙保全、赵健彬《“边疆治理”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② 参见李朝辉《2016年中国边疆治理研究述评》，《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代表作有周平《中国的边疆与边疆治理》，《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2期；陈霖《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吴楚克《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何跃《冷战后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全困境与安全治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孙勇编著《维护西藏地区社会稳定对策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③ 参见邢广程《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新思路》，《边界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2期。

④ 参见周平《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利益边疆》，《探索与争鸣》2014年5期。

⑤ 参见于沛《从地理边疆到“利益边疆”——冷战结束以来西方边疆理论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

⑥ 参见邢军《特纳的边疆学说及其对我国沿边地缘政治经济研究的启示》，《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6期。

⑦ 参见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93页。

全与稳定是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内容。它与边疆治理有一脉相承的地方,近年来研究成果较多^①构成了一个相对系统的话语体系。

各种围绕中国边疆所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分别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同时在话语的内部结构与逻辑上,也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因而,我们需要建构更全面、更科学、更具有指导作用以及包容性的话语体系,以适应中国边疆学的时代需求。

四、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特征

中国边疆学发展至今天,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特征。

首先,具有传统性与继承性。由于中国历史悠久,所以中国边疆与欧美以及其他国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传统的厚度与继承的体量都远胜于其他。因而,以中国边疆的历史与现状为研究对象的中国边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至为密切。一方面,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史事的考证从来是历史学的研究内容;另一方面,现状从来不能脱离历史而存在,尤其是现实问题的出现往往与历史密切相关。因此,“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中國边疆学赖以生存的基础”。^②当代边界研究受益于对边界变化进行解释的历史分析,这既可以避免将理想的边疆状态与历史实际相混淆,而且也会理解民族国家不仅对领土具有主权,事实上,在意识形态的建构中也存在“自主性”,在自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尊重历史,保持传统,是边疆学话语体系构建的任务之一。

其次,中国边疆话语体系的建构遭到挑战。对疆域作整体考察时可知,人类对于边缘的审视与经营往往着力更多,原因之一在于,此边所接壤的是彼边,虽然边疆远离“中心”,但却是文化、政治、民族碰撞最为直接的区域。边疆既有“传统的友谊”,也有现实的龃龉。自近代以来,围绕边疆区域,中国与邻国的认识体系有所叠合,存在制造史料的情况,进而造成历史系统交叉而且冲突,这其中包含着在围绕历史事实进行争论与解构,进而建立新的话语体系的过程“受到自身的国家、民族、阶级、性别等身份认同与社会现实的影响”^③同时也在于被静止的现实边界切割的历史,被刻舟求剑式的逻辑所解构。中国的边疆研究从学理层面的回应不能够得到基本的认同,焦虑、矛盾以及冲突在各自的边疆话语中有明确体现,比如本世纪以来,中国与朝鲜、韩国围绕历史问题的争执,一度从学术研究走向舆情,最后上升到外交层面。由于边疆的地缘属性,它具备核心以及其他区域所不具备的敏感,因而,边疆学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导作用。无论是边疆治理,还是边疆安全、边疆利益,话语的科学、适用、连贯而且完整,具有重要意义与深远影响。因而,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往往受到学术之外的干扰,进而脱离学术的轨道,成为边疆政治或边疆外交,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边疆学存在有“话”无“语”的情况,急需使其回归学术本身。

再次,边疆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平衡作用。边疆所承载的信息是丰富的,在利用相关信息进行解读的过程中,如果过于偏重现实,也就是说有意无意地减少历史分析,毫无疑问会弱化历史记忆,掩盖边疆地区在文明初期被经营的模样,以及政治势力最初开发“边疆”

^① 参见万秀丽、牛媛媛《国家安全视野下西部边疆治理研究》,《实事求是》2018年第1期;郭才华《论我国边疆的安全问题——以新疆地区文化援疆为视角》,《知与行》2017年第11期。

^② 马大正《关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学术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

^③ 王明珂《从中原到边疆:对典范中国史的反思》,《文化纵横》2015年第4期。

区域的历程,进而强化在当今的边界划定后,边疆成为边疆,国家各自守边自持的现实在历史上的“合法”性。这也使得社会科学分析在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发展之后,经过反复夯实与论证,观点在一方强硬,另一方默许的情形下,将停留在思想与学术层面的讨论完全归咎于本地化的民族主义偏见,以表面文质彬彬的讨论,掩盖暴力实践的严重影响。民族国家理想的疆域往往与事实有很大的差距,而一旦掩盖了历史发展历程,边疆所连接的两国之间和平相处的心态可能会在事实与欲望的冲击下失衡,进而导致边疆这一蓄水池波澜不惊,从这个意义上说,边疆在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之间,起着巨大的平衡作用。

综上,中国边疆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产物,由于地域广阔,此疆之内的政治、自然、社会状况,同边界之外的毗邻势力既有差异,也有联系。“中国边疆”拥有丰富的内涵,从学科的角度看,尚处于建构的过程之中,属于“新兴”;从研究的角度看,历经千年积累,百年探索,三十年创新,^①可谓“悠久”。有机承载了“古”与“新”这一悖论性命题的中国边疆学,具备哲学社会科学所要求的“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②的各个层面,其学科意义与价值已经充分体现。话语体系只有通过充分的凝练与完善,才能满足边疆学学者们分析评价丰富而复杂的中国边疆学建构的紧迫需求,突显中国边疆学的实践价值。

推进中国边疆学研究,当前的关键要务是扎实建构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清醒认识当代话语体系的偏颇会肢解传统中国的边疆。特别要弱化学术之外的力量对于话语体系建构的干预,建立与周边国家的边疆话语体系平等、平和的学术对话机制。毫无疑问,从空间的角度看,边疆是一个现实的隔离带,但从历史的长线看,也是两个邻接政权交融互动的平台。两者将楚河汉界划定,各守其边的过程,无一例外都经历了政治与文明的反复推拉。现实的“边界”是邻国彼此认可的界线,却无法规避文明与历史被切割的事实,由此带来围绕学术体系的不睦与纷争。因此,中国边疆学的科学建构,对于维护边疆话语体系的完整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责任编辑 刘清涛)

^① 参见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② 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103/c416126-29743631.html>),访问时间2018年4月6日。

some contemporary variable quantity for “China’s Borderland Studies” to be developed today , this research object’s inner academic value and its logic extension make it become a subject system to be noted. This become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is article to discuss the concept of “China’s Borderland Studies” , and its definition and subject system.

Key Words “China’s Borderland Studies” Definition Academic System Construction

Some View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Borderland Studies” Cui Mingde (38)

The author thinks that “China’s Borderland Studies” is a comprehensive subject , the current subject construction should endeavor to focus on research direction , assemble research team , build research platform , cultivating researchers , reach landmark achievement.

Key Words: China’s Borderland Studies Subject Construction Effort Direction

Some View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 Theoretical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a’s Borderland Studies Wang Xin (41)

In the new era ,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y and subject system of China’s Borderland studies should start with clarifying and defining basic concept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text , base on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civilization systems of agriculture and nomad , grasp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evolution and foundation of territory form of China’s premodern multi-national state , explain the historical rationality and modern legitimacy of today’s China’s territory academically , construct discourse and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China’s own characteristics , features and styles , on which carry out dialogue with international academy.

Key Words: China’s Borderland Studies Territory Form Discourse and Theoretical System

Construct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a’s Borderland Studies with China’s Characteristics

..... Miao Wei (47)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of China’s borderland studies , is mark of maturity and obvious requirement of this subject. In history , borderland had been considerably noted in views of China’s civilization , with an accumulation of systematic and abundant historical literature material , theoretical discussion from many perspectives. In the recent 30 years , series of discourses have been formed surrounding border , administration , security and interest , which embodies some characteristics , like the confusion of interlacement of tradition and reality , trouble of overlapping neighboring countries’ discourse. Constructing discourse system in accordance to China’s history , and in service to China’s borderland reality , is an important work for China’s borderland studies.

Key Words: China’s Borderland Discourse System Subject System Academic System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Studies in the New Era Tian Shu (56)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borderland studies in the New Era , and thinks that in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borderland and “the Great Unification” , the relations between frontier and center , specialty and normal , turbulence and stability , war and peace , should be dealt with. Only by integrating borderland history with general history and dynastic history , and embarking the research way of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 the content of China’s borderland studies can be really broadened , China’s scholars’ discourse power on borderland history can be really improved.

Key Words: the New Era China’s Borderland “the Great Unification”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With People as the Base of State , When the Base is Strong State Will be Peaceful” —On Humanitarian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in Borderland Studies Luo Qun Lin Xi (61)

People as the subject of borderland region , “with people as the base of state , when the base is strong state will be peaceful”. The existence of borderland means the existence of people , people are the ultimate reason for borderland to exist , and the most central part is still all the borderland peoples’ cogni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borderland and state. As the inhabitants of the region , their historic mission defined that all the borderland peoples are the base and pillars of state and borderland stability. Accurately understanding borderland people’s meaning to state development , is not only the question must be faced by borderland studies , but also the question with basic influence for today’s borderland studies , which can inpour energy and dynamics into and benefit the further